

大 / 学 / 之 / 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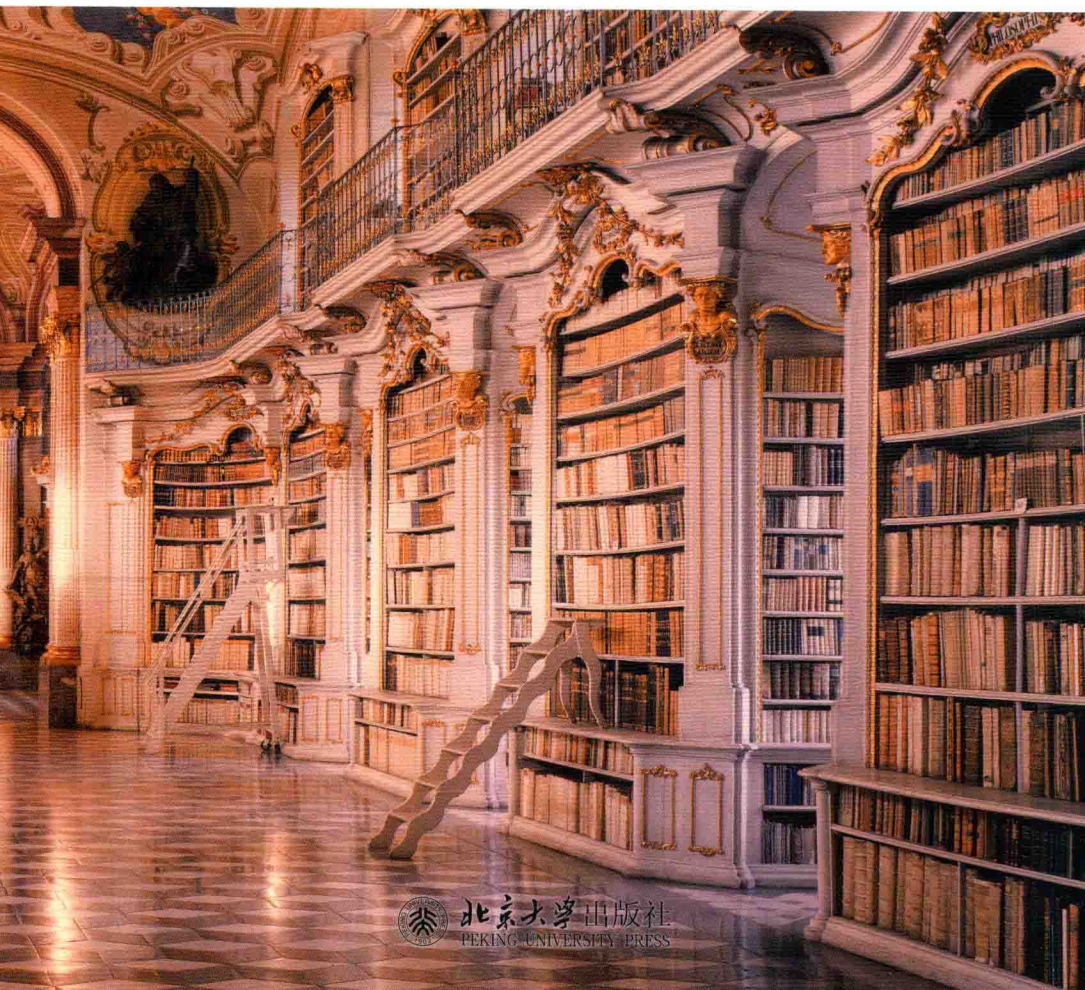
Mc
Graw
Hill



Challenging Knowledge
The University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

知识社会中的大学

[英] 杰勒德·德兰迪 著
黄建如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Challenging Knowledge

The University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

知识社会中的大学

[英] 杰勒德·德兰迪 著

黄建如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5-563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社会中的大学/(英)杰勒德·德兰迪(Gerard Delanty)著;黄建如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5

(大学之道丛书)

ISBN 978-7-301-29836-7

I. ①知… II. ①杰… ②黄… III. ①高等教育—研究
IV. ①G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99218 号

Challenging Knowledge: the University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
Delanty, Gerard.

ISBN: 0335205798

Copyright © 2001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photocopying, recording, taping, or any database, information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This authoriz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Copyright © 2019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人事先书面许可,对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复制传播,包括但不限于复印、录制、录音,或通过任何数据库、信息或可检索的系统。本授权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麦格劳-希尔(亚洲)教育出版公司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此版本经授权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销售。

版权© 2019 由麦格劳-希尔(亚洲)教育出版公司与北京大学出版社所有。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Education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书 名 知识社会中的大学
ZHISHI SHEHUI ZHONG DE DAXUE
著作责任者 [英]杰勒德·德兰迪 著 黄建如 译
丛书策划 周雁翎
丛书主持 周志刚 张亚如
责任编辑 刘 军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836-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r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67346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15.5 印张 204 千字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精装版)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 大学之道 —

前言及致谢

这本书的写作源自我一段时间以来关注的三个独立的领域，即：知识社会学、现代性社会理论以及从启蒙运动时期到全球化时代有关大学理念的争论。本书的目的即在于把这些差别非常大的论题整合在一起，以此为基础对 21 世纪大学的身份认同(identity)进行再思考。我曾经尝试着将大学视为现代性的关键机构，同时也是知识、文化和社会交汇的场所。我认为现代大学本质上是科学知识与文化知识的生产者和改革者。绝对不能认为大学仅仅包括科学或者文化，因为它是一种对社会上各种知识起协调或联系作用的机构——尤其是使学术知识与文化中原有的、清晰的认知结构相融合的重要机构。这种对大学非常谨慎的“带普遍性的”(universalistic)观点意味着大学最重要的职责与其自身的交往能力和公民身份有关。尤其在今天，它需要承担表述技术公民身份与文化公民身份这样一种职责。因此我想说明，大学的特性既不取决于技术策略或管理策略，也不取决于纯粹的学术追求：在“知识社会”中，知识不能被简单地“利用”或被看做仅仅是知识本身，因为它已经融入了处于社会深层的认知联合体、概念结构以及权力与利益的认知结构中。除了做一个被动的参与者，无助地被拖进市场，大学还可以起到引领改革的作用。这样，与其谈论(抱怨)大学的消亡是后现代背景下知识变得支离破碎导致的结果，或者是民族国家逐渐消亡的结果，或者是引入市场价值观的结果，还不如说是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理论的方法促使大学形成新的特性，即根据自身的能力来扩展以反映社会广泛的需求，并以此来巩固大学在知识社会中的公民身份。

本书是以本人 1998 年参加《社会认识论》(1998 年，第 12 卷)关于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基地问题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为基础

而写作的。书中所包含的现代性理论出自我的《变革世界中的社会理论》(政治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本书以及我在“重组知识/转换机构:知道、知识与21世纪的大学”大会上的发言(1999年9月17—19日在美国马萨诸塞—阿姆赫斯特大学举办,后来发表在《组织》2001年第8卷第21期上)。

很多人阅读了本书的初稿。我对他们精细入微的、有益的意见深表感谢。感谢开放大学出版社的约翰·斯克尔顿,是他建议我写这本书的。同时还要感谢开放大学出版社商请的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议以及文字编辑有价值的更正工作。本书的不足之处与他们的建议无关,书中提出的观点也不代表他们的思想。

杰勒德·德兰迪

2000年5月

目 录

前言及致谢	(1)
导言：挑战知识	(1)
第一章 知识与认知：重新认识知识社会学	(17)
对知识社会学的再思考	(20)
认知的变化与现代性社会理论	(26)
大学与知识的变革	(31)
第二章 自由的现代性时期的大学：在世界主义与 民族国家之间	(37)
现代大学的兴起	(40)
自由的现代性：19 世纪	(49)
自由的现代性的衰落	(55)

第三章 组织化的现代性时代的大学：资本主义、	
国家与公民身份	(61)
大学与公民身份	(66)
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大学的认知功能	(71)
社会变革与大学	(78)
第四章 改革构想：民主、反主流文化与交往	(81)
组织化的现代性的危机：文化危机与政治危机	(85)
新德国关于大学的争论：哈贝马斯、伽达默尔和	
谢尔斯基的观点	(90)
学生反抗的兴起：马尔库塞、托雷尼和里斯曼	(97)
第五章 批判的制度化：知识分子、公共领域与大学 ..	(103)
曼海姆和葛兰西论知识分子和现代性	(106)
传统知识分子与保守的批判：从本达到布卢姆	(110)
古尔德纳论新阶级和大学	(112)
寻找公共知识分子	(117)
第六章 学术权力与文化资本：布迪厄论	
知识与大学	(123)
教育是社会再生产	(126)
大学的权力领域	(131)
自反性、学究的谬误和知识分子	(136)
第七章 大学与新的知识生产：从生产者到使用者	(141)
知识的终结？	(145)
新管理主义	(149)
知识使用者的兴起	(150)
教学与科研的分离	(153)
超越模式 2 的分析	(155)

第八章 全球化与学术资本主义：新知识流	(159)
全球化、国家和大学	(162)
学术资本主义和三重螺旋结构	(167)
虚拟大学的现实性	(174)
世界主义还是全球化	(176)
第九章 后现代大学：解构知识与制度	(179)
后现代主义与知识	(182)
后现代大学理论	(184)
废墟中的大学	(192)
第十章 知识的新政治：文化战争、认同与多元	
文化主义	(197)
文化战争与大学	(201)
向文化和理论求助	(205)
超越工具主义和相对主义	(209)
结论：知识、公民身份和自反性	(211)
参考文献	(221)
术语表	(235)

【导言】

挑战知识



西方社会与政治思想体系的历史可以说是两种知识,即科学知识(knowledge as science)和文化知识(knowledge as culture)之间根深蒂固的冲突的表达。这种冲突最早起源于古希腊最经典的理念(logos,旧译逻各斯)与信念(doxa)之争,即知识与观点之争,正是这一冲突使得知识的地位高于民主。众所周知,柏拉图将普通知识构成的世界当做幻想加以拒绝,同时他也拒绝民主,认为民主是政治堕落的表现。这一认识并非没有原因,因为雅典成为自治的民主政体后,它最早的行动之一便是审判作为知识典范的苏格拉底,判其饮鸩而亡。由此可见,知识与民主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消除洞穴和学园之间的差别。

从柏拉图的“学园”转到康德请求普鲁士国王按理性原则建立大学这件事上,我们看到的是又一个证明知识与民主之间关系不和谐的例子(Kant, 1979)。康德关于现代大学的观点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他所提出的把民主限定在学术话语的范围内的贵族共和主义的观点。在区分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和私人理性(private reason)时,康德认为前者适合在经院主义演讲中出现,而后者则不会被讨论。他将任何可能破坏社会

正常功能的因素都排除在大学之外。这样，大学中已被制度化的那些公共理性就被去政治化了。我这本书的主题恰恰是考察大学视野下知识与民主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有可能存在知识的民主吗？如果有，它将会由什么组成？它将催生什么样的大学？

大学目前的状态反映了知识在这个时代所处的位置。其中最具震撼力的方面是交流已经渗透到了社会认知结构的最深层，而与此同时，交流也渗透到了民主的最深层，因为知识和民主都是通过交流而发生变化的。在过去，从启蒙时期到战后时期的现代性时代，知识的创立存在于交往之外的空间。而现在，这个地方主要被大学占据。因此，知识主要存在于“大学”这种机构之中。这一概念将知识置于大学而不是置于社会之中，就好像在柏拉图看来“城邦”陶醉于洞穴的认识状态一样。交往的行为方式在大学没有得到多大的响应，因为他们将自己限定在前政治的(prepolitical)个人领域或者公共领域当中，而大学本身被排除在外。尽管大学常常是知识分子对抗权力的重要场所，这种传统却主要是通过提供专门性的、有用的知识以及保存与再生产民族文化传统为民族国家服务的。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认知结构的保护者，大学在以自治为主要特征的知识领域代表了一种认识范式。这在本质上是一个关于社会与政治秩序方面共识的范例。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社会上的不一致只是偶尔渗透进了大学，而19世纪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和都柏林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的建立却是例外，并且，他们的建立还引发了几次非常重要的关于“大学理念”的争论。于是大学与政府之间便有了约定：大学拥有了自治的权力，而作为回报，大学就必须满足政府在认知方面的需求。现代性进程中伟大的社会运动(包括工人运动、废奴运动、殖民地解放运动等等)对学术象牙塔及其傲慢的、与世隔绝的姿态都没造成多大的影响。

这种知识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末遇到了挑战，到70年代中期，很多国家的大学都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改革。不过这些改

革对知识的实际产出方面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其中有些改革为了满足学生代表的要求和恢复古代机构的民主的需求,仅仅关注了大学机构组织方面。尽管大学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了民主政体中公民身份激进化的重要场所,那种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在仍然处于工业社会的时代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今天在我们这个后工业社会发生的一切,无论对政府结构、社会认知结构(就像几十年前发生的一样)还是对作为民主扩展的结果深入到知识本身的知识构成来说都是一种危机。20世纪70年代初,大学依次通过民权运动、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女权运动强烈拥护公民身份、政治权利以及社会权利时确实接受了民主的公民道德意识。这些运动所关注的问题相对来说是超越认知的,因为他们与知识的生产本身不直接相关,而是与诸如民主、公正、幸福、公平和解放等理念相关。尽管有广泛的文化批评,但知识模式本身并没有被民主改变。

民主政体有一个特点就是无政府主义:它是任何一个喜欢社交的人都不会居住的场所(Lefort,1986:279)。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中,这种纯粹的民主经过了法律规则的修饰。在知识领域,这种民主的法律形式以及民主政体的其他方面(多元化或各方利益的代表,还有公民身份或者公众的参与等)都受到了限制,这是因为知识结构是开放的。因此当社会力量介入时,其结果就常常是知识被意识形态化了。不过,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类似知识民主的理想就可能变成现实。今天,这种理想更有可能实现,因为挑战不只是来自公民社会中民主的力量,就像1968年所发生的那样,其不同之处在于目前面临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知识结构及其与文化产品关系的变化。我坚持认为这种公民社会对大学的入侵可以更温和一些。根据我的判断,目前的情况非常有趣,因为不仅是在学院里,同时也在社会中更广大的范围内都存在很多对知识的质问,这就会产生一种不同的认知结构,一种新的、更具自反作用的知识。那些问题中超越认识/认知,或知识/文化之间区分的例子,都与生物工艺学、生物伦理学、自然科学、生态学及承受力、人口的增长、信息技术和

多元文化主义有关。换言之,目前文化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直接与知识相关。本书的观点是,如果大学不对变化中的知识产品及认知结构转变的本质作出反应的话,它就不得不应对技术公民身份与文化公民身份合法性受到的挑战,技术公民身份与文化公民身份也被认为是新的认知结构的基础。

吉本克斯(Gibbonx *et al*, 1984)认为,一种新的知识模式(被称为“模式 2”)正在逐步取代组织化的现代性的知识模式(“模式 1”)。这种新模式特征在于,它使很多知识生产者在需要解决的问题通常情况下都很明确的环境中专心致志,勤奋工作,并最终使成果增值。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受到一系列新知识生产者的挑战,大学已经不再是知识生产唯一的场所了。随着多学科方法成为新的标准,新的“后学科”现象逐渐占上风,学科界限逐渐模糊(Turner, 1999)。这种情况发展的结果将会怎样还不很清晰。对有些人来说,它可能意味着知识的终结,或者至少是某一种知识的特定概念,即通过自我规定或遵守元叙事(meta-narrative)的规定而有合法性的知识的终结,例如,利奥塔(Lyotard, 1984)就持这种观点。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大学丧失合法性的情况已广泛存在,这是现代性本身面临的最后一个严重的危机。这一危机在对知识的斗争中尤其明显。正如 20 世纪的开端见证了 19 世纪末的知识模式和主流文化形态的终结一样,我们今天也见证了伴随着组织化的现代性及其文化形态、组织框架而出现的知识模式的终结。学科与国家界限造成的专门化已经被今天的知识领域排除在外,而大学也已不再享有对知识的特权。在大学身份的特性背景下,对知识的斗争(首次爆发于 1968 年)采取了一种更为激进的形式向社会文化形态渗透。在旧的社会主义运动尚未结束而新的政治主张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大学成了文化特性、对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确切定义以及通过历史沉淀下来的经典著作等问题斗争的主要战场(Bloom, 1997)。在这些争论中,后现代主义者对身份认同的态度——倾向于多样性和差异性而拒绝对主体下确定定义,已经渗入认知结构,使得这个时代的秩序趋于多元而不是一致。

所有这一切均表明，正如纽曼(Newman, 1996)或雅斯贝尔斯(Jaspers, 1960)在他们的名著中提出的那样，认为大学建立在一个基本的、认知的“理念”之上的观念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现代社会中有多少种认知结构，也就会有多少种大学理念。随着大学使自身合法化的理念或一种基本认知模式的丧失，以及认知模式中多元秩序的涌现，就出现了身份认同的问题。那么，目前的情况对大学来说是危机之一，就像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广泛发生关于大学身份认同的讨论中所看到的(Barnett, 1994; Berube and Nelson, 1995; Scott, 1995; Sommer, 1995; Readings, 1996; Rothblatt, 1997a; Bowen and Shapiro, 1998; Delanty, 1998a, b)。假如不是因为知识合理化的一个方面就是增加自反性这样一个事实，大学拥有被合理化过的知识，就会处于因合理化失去自身存在的危险。当这种自反转向知识产品时，大学就成为对知识与现代性的含义进行文化再解释的一个焦点。从19世纪文化危机开始的确定性的减少因科学中认识论方面的不确定性也已渗透到科学的中心。科学中认识论的不确定性反映在大学的身份认同危机和风险管理方面。

知识模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17世纪末国家与知识间形成的历史契约(historical pact)正在逐渐变得松散。虽然国家依然是主要的向知识提供资金的资助者，却不再是知识生产唯一的保卫者。确实，国家正在增加它对知识的资助，但知识生产同样得益于其他资源。全球化进程也对民族国家知识生产的封闭性产生了影响(Scott, 1998b)。在所有社会资源中，恰恰是知识，因为它非个性的、普适性的特征，使自己最容易融入全球化。其次，现代社会无论是在经济生产、政治管制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对知识的依赖都越来越大。这就使得这一判断更加可信：我们正生活在后工业/信息社会最后阶段的知识社会中(Stehr, 1994; Castells, 1996; Bohme, 1997)。知识模式的第三个变化是大众教育、社会异议及新的社会运动、新信息技术的涌现的结果，即知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地在社会中

传播——不再限于精英分子的范围,而是更多地被公众掌握。这样,普通知识与专业知识再也分不开了(Wallerstein *et al*, 1996)。这种洞察力是自反(reflexive)理论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晚期现代性中,知识越来越关注对自身的适应性,而不是关注对其他事物的适应性。第四,也是最后一点,知识向相对民主化发展的过程中,知识发现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随着越来越多有活力的人被不断吸引到知识生产领域中来,年长的知识精英们的合法性越来越不确定了。在这个充满风险的社会中,随着科学合法性的广泛丧失和民众对科技应对社会尽义务的呼吁,由专家主导的文化陷入危机之中(Beck, 1992)。

因而,我的观点是,目前的状况可以归结为一次大的认识/认知的转换。知识模式的变化与文化模式的一次变革有关,在这些变化的背后是意义更深远的社会制度架构方面的变化。目前的状况要求阐明公民身份的技术形式和文化形式,使公民身份中原有的公民的、政治的与社会的权利更为完善。这一观点与卡斯特尔(Castells)关于信息时代的论述及其他关于知识社会的观点都不尽相同(Stehr, 1994),这些观点最终往往走向技术决定论。知识比信息更丰富,因为它比信息的适用范围更广,知识是工具性知识,它与社会的认知结构相关。这一点也是新知识生产理论的一个不足,这一理论把知识简化为对信息的运用(Gibbons *et al*, 1984)。我不认为知识仅仅是专家们的事情。提到“知识”这个词,我指的是一个社会提供学习机会的能力,一种与文化模式及制度革新成果相关的认知能力。当代社会,知识渗透进了生活中所有的领域,这一点已成为最鲜明的时代特征之一。社会成员拥有了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大的自我解释与行动的能力,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正生活在知识时代(Giddens, 1990, 1991; Melucci, 1996)。专业知识和普通知识不像过去那么界限分明。知识社会的理念还包含一些基本的东西:逐渐开放与知识反思有关(reflexive relation)的新的认知领域。

根据前文的分析,对当今大学的身份认同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后现代的解释(Lyotard, 1984; Crook *et al*, 1992; Readings,